

“墨中含绿”的大传统

——评《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

■ 安琪



玄玉的产地之一塔什库尔干县喀喇昆仑山（视觉中国）

《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
叶舒宪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坡出土的玄玉环

中国人从小就熟知“君子比德与玉”的老话，也都知新疆和田出产的羊脂白玉价格之贵重。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华夏文明尚未孕育出生的史前时代，早在白玉一统天下之前，还存在一个以黑为美的“玄玉大传统”。这个时代是指距今5500—4000年左右的以深色玉料为礼仪用玉主要原材料的漫长时期，汉字还要等1500年才真正形成甲骨文这样的占卜叙事载体，真可谓是上古茫昧难考索了。那么，今天的我们该采用什么途径来接近甚至重新审视这段被遗忘的历史？

赋予沉默而神秘的
上古圣物一种言说的能力

在文献一筹莫展之处，隐约有物象发声言说。《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的作者叶舒宪给出的路径是“物的叙事”，在他看来，玄玉构成的史前玉礼器序列，如同牵引我们走入迷宫的线团。传世文献讲夏的历史，绕不开大禹治水与禹铸九鼎，除了《史记·夏本纪》提供的夏世系和茫昧难考的神话，我们对这段失落已久、尚无文字可以凭依的史前史所知寥寥。近20年来，作者带领的科研考察团队以9000年玉文化的大传统为立论基石，对西部七省区250个县市进行了周密的调查采样，足迹覆盖中国境内出产玉礼器的地方。拉网式的普查提供了种类丰富、数量庞大的田野样本，重新建构起玉礼器的神话学，揭示华夏文明的精神和信仰之根，提出“玉文化统一中国”的独创观点。前八次的考察聚焦点是与夏商周玉礼制传统直接对应的齐家文化，也就是距今4000年左右中国境内最发达的地域性玉文化，从2016年的第九次考察开始，玄玉成

为新的关注点，作者带领的队伍摸清了有关玄玉时代的空间分布问题，并提出“玄玉大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是中原玉文化与西部玉文化的共同起源期。《玄玉时代》一书就是对这一观点的集结。该书以物言事，严谨而清通的论证赋予这些沉默而神秘的上古圣物一种言说的能力。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将作为物质文化重要“证据”的玄玉视作一种神话具象和观念的凝结。今天以华夏文明探源为起点的形形色色的“中国故事”，本质上就是一种建基于神话思维的文化，其形态也是由神话的文明大传统为载体的。在对华夏文明探源的研究中，城市、青铜器和文字是国际学界普遍用于认定“文明”的三个标记，《玄玉时代》则指出，玉礼器相较于这三者而言更为古老，系谱更庞大，且有着传承不断的链条可供复原，为我们今天回溯华夏文明起源、从文化基因层面来解释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源流，提供了重要的物证，而这个具有高度符号价值的线索却被人们长久地遗忘（第33页）。再加上20世纪初“古史辨”派所倡导的古史解构论的流行，正史之外的“志怪”

空间更是一再被压缩，如果没有玉礼器这类新物证的加入，《山海经》《竹书纪年》这样的上古奇书在下一个世纪恐怕真的要在“疑古”的浪潮下被迫退出历史学研究领域了。

《玄玉时代》将玉礼器定义为一种中原文明国家发生初期的圣物原型，即一种承载了神圣意蕴和神话思维的“显圣物”。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概念，作者举出三例今人习焉不察的“物证”——其一是台北故宫所藏“网红级”文物，清代翠玉白菜；其二是苏美文明中与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相关的“神圣的镐头”；其三是台北排湾族珍藏于古壶中的琉璃珠。这三种“显圣物”虽出自不同文明的不同阶段，但都带有“让物显圣”的精神投射内涵，因而被神圣化和神话化。玄玉同样具备这样的宗教信仰的内在逻辑。

恢复玄玉“中原文明
第一玉”应有之美誉

《玄玉时代》对“显圣物”的关注没有忽略其物质属性，也没有完全架空其历时演变的过程。本书最令人赞叹的部分是作者对玄玉颜色以及“玄黄”二元论的考辨论证。玉色是玉作为一类“物”的重要属性，从战国以来玉色问题就一直被聚讼不休，但受制于实物之不足，长期以来学者们都只好以文献为据。随着20世纪中国考古学不断积累成果，新材料日益增多，对夏商周三代礼器的颜色好尚问题作出宏观的把握和判断，时机已然成熟。

对礼制艺术的重构需要极大地倚重于礼器的内在视觉和形式因素。作者有关“玉色”的探寻首先聚焦于“玄玉”的定性：这种深色的蛇纹石到底能不能算是“玉”？这个问题看似微小，但

实际上却是作者立论文之基石。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收藏界和文博界的常规定义里，蛇纹石玉料多享“假玉”之名，甚至干脆被视作石器（第69页），本书作者则在大量经手实物的基础上纠正了这一看法，为玄玉正名；这种深色的蛇纹石玉料内部蕴含绿色的内质，在电光照射实验中显示出“墨绿间杂”的特征，他甚至提倡恢复其“中原文明第一玉”的应有之美誉（第70页）。

其次，为什么在特定的史前时期，会流行这样一种对“墨中含绿”色彩的追捧和信仰？作者追问的路径是从文献入手，用实物作答。

叶舒宪认为，玉礼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玄素异位”的变化，玄是我国上古文献中记载的自黄帝时代至夏商周时代的“显圣物”的标志颜色，墨绿两色相间相杂为美。崇尚古礼的墨家为何以“墨”为自己学说和学派命名之迷，终于在墨家沉寂2000年之后，得到重新认识的契机和线索。玄字蕴含着玄妙与变化的意思，同样在墨与绿两色之间的视觉感知上，得到原物的求证。史前玄玉大传统的尾声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陕西石峁遗址中，该遗址出土的玉礼器中，玄玉制品数量不少，该遗址的年代正对应着《尚书·禹贡》中记载的夏代“禹赐玄圭”的原型。但石峁遗址白玉的比例也相当高，这说明原先由玄玉独占的情况被打破和逐渐取代了（第240页）。年代稍晚近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玉礼器的基调是浅色，玄玉已经退却到相当次要的位置。产自中国西部的浅色调的优质透闪石玉料成为主流，特别是羊脂白玉的登场，标志着玄玉时代的终结（第238页），及至周代初年，已经形成了以纯色为尚的华夏美学基础，直接影响了后世

儒家的玉德理论。

跳出中原中心主义的
窠臼，聚焦“边疆”

《玄玉时代》的第二点创新，在于跳出中原中心主义的窠臼，聚焦长久被人们忽略的“边疆”，关注中原以西地区的史前玄玉的分布情况，并兼顾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这几个时间段。事实上，作者早已指出，玉文化的星星之火不仅出现在史前中原腹地文化当中，甚至可以沿着乌苏里江与西辽河流域，一直溯至内亚（Inner Asian）的广大地区，贝加尔湖和西伯利亚的“玉殓葬”现象，连同日本本州岛的勾玉文化，构成了亚洲玉石信仰的整体奇观。在本书中，田野调查的成果表明，作为“显圣物”的墨绿色蛇纹玄玉出现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处（陇东地区）的常山下层文化、山西省襄汾陶寺文化和晋、陕、豫三省交界处的山西省芮城清凉寺文化当中。这足以说明，早于二里头时期的文化权力中心，并不位于中原腹地地带，而更可能是位于晋南和陕北，时间大致相当于夏代甚至是夏之前的唐尧虞舜时代（第176页）。这一发现是对中原史前考古的重要推进，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二里头被认定为夏代都城，而如今根据玄玉提供的信息，前二里头时期的陶寺遗址和石峁遗址的年代更早，遵循的也是比白玉礼器传统更久远的玄玉礼器文化传统。

《玄玉时代》聚焦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史前文明，无疑是对多元文明起源论的深入和细化，13次考察的成果，更是在物证上拓展了“中原中心说”的外延与内涵。针对很多国人耳

熟能详的说法，作者以新材料为依据提出了极有说服力的新观点，比如《千字文》中一语定乾坤的“玉出昆冈”，作者就通过多次实地探查，将其细化为“玉出二马冈”和“玉出三危”的新观点。他认为，只有对中国西部用玉传统的大变迁进行纵向的历史分期分期论证，才能突破“玉器时代”的笼统界定；只有彻底摸清西部玉矿资源如何借助黄河支系的水路流入史前玉文化的集中发现地，才能横向建立起中原与西部边疆之间文化沟通与互动的历史网络，进而准确标识出奠定中原文明的礼制基础。顺便对丝路由来之谜的探讨，提供充分的本土新知识和本土话语。

总体来看，《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重新解释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国”，在汉字的符号系统里被形象化地写成四方城墙环绕一块玉？作者不仅回答了为什么华夏文明以玉为尊，而且还进一步告诉读者此玉非彼玉也，最原初的玉石信仰是建立在一套“墨中含绿”的玄玉大传统之上的。该书对于玉的物理属性，其生产、消费与流通的全周期的梳理，以及从“显圣物”的角度剖析玄玉文化大传统的神圣记忆与精神内涵，都是以再造本土特色的“格物致知”范式，对西方“物质文化研究”学派的呼应与超越。从风格与手法上来看，该书堪称一部视野高屋建瓴、论证丝丝入扣的佳作。它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和历史分期，展示了文明雏形期“玄玉大传统”的核心元素与基本样貌，以“中国理论”更新了我们对于华夏文明起源的整体性认知。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副教授）

一颗珠子上的考古延长线

■ 常洋铭

自1946年夏鼐先生的博士论文《埃及古珠考》通过伦敦大学审核，至今已过去了70余年。70多年来，随着埃及考古发掘范围的扩大、发掘技术的进步和对出土文献材料的进一步掌握，我们对于埃及古珠的了解也大大增加。但是，诚如现任伦敦大学学院埃及考古学教授斯蒂芬·夸克所言：“夏鼐的博士论文太成功，让伦敦其他学者望而却步，他们不想花一生经历重复这项工作。”因此，时隔70年正式付梓的中英文版《埃及古珠考》依然是富有参考价值的。当代学者对于埃及古代珠饰的研究，依然处于夏鼐先生博士论文的延长线上。

在夏鼐撰写博士论文的时期，对于埃及古珠饰的研究极具挑战。即便是由官方机构和学者主持的考古活动，往往也缺乏详细和完整的绘图与文字记录。在出土的数以万计的埃及古珠之中，有一颗蚀花肉红石髓珠引起了夏鼐特别的注意。在提交了博士论文后，夏鼐在1944年的《驻孟加拉王家亚洲协会会刊》上发表了专文《埃及所见蚀花肉红石髓珠》。这篇论文所探讨的珠子之一出土于阿拜多斯第197号墓，是皮特里在1922年的田野发掘过程中发现的。根据同一处出土的碑铭可知，这一墓葬年代为埃及中

王国时期第11王朝。当时的阿拜多斯虽然不是王国的首都，但是依然因它在宗教信仰方面的重要地位而兴盛。这颗珠子引起夏鼐特别注意的是，它并非来自于埃及本土，因其形状和纹样在两河流域大量出现，同时在印度河流域也有发现的一类珠子相同。因此，夏鼐认为“这颗珠子无疑是从美索不达米亚进口的”，并且列举了同时期西亚北非物质文化交流的其他证据，如刻画着楔形文字王名的埃及雪花石膏瓶、刻有埃及象形文字的滚印和在埃及广泛出现的许多青金石制品以及一些青金石制品上所刻写的楔形文字铭文等。但在夏鼐撰写博士论文的时期，即上世纪40年代，关于两河流域和埃及早期断代的研究尚不完善，因此，他当时没有余力再对这些文化交流的证据做进一步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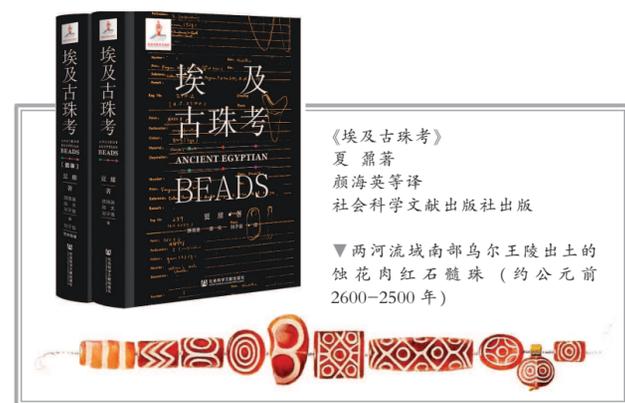
回顾皮特里对阿拜多斯第197号墓的记录可以得知，这一墓葬中的主要物品是石器和珠饰，后者之中就包括这颗蚀花肉红石髓珠。珠子长约14毫米，直径约8毫米，其表面是人工处理后形成的相连的眼状纹。所谓“蚀花”，其实是在加工过程中用碱性物质在石头的表面勾画出纹路，加热后石头表面被碱性物质腐蚀，白色的碱性物质留在腐蚀掉的沟槽中，形成的

色彩相间的纹样和图案。经过数千年的埋藏，出土珠子的沟槽中的白色碱性物质已经磨损消失，表面只留下了被蚀刻过的沟槽。通过对比吴雷（Leonard Woolley）在两河流域的乌尔（Ur）、基什（Kish）等遗址和马尔歇尔（John Marshall）在摩亨佐达罗发现的同类珠子，夏鼐认为，阿拜多斯出土这颗珠子是从西亚传来而非埃及本土制造的，这一结论在当时非常准确。如今，基于二战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在夏鼐的结论之上更进一步。

虽然这类蚀花珠饰在两河流域的南北各地都有发现，但它可能并非源于两河流域本土，更可能来自于夏鼐所注意到的、同样发现了此类珠子的印度河流域。在印度河流域，这类珠子出现的时间最早至公元前4000年代中晚期，在公元前4000年代末至前3000年代中晚期从印度河流域传入两河流域。不过，两河流域出土的大部分此类珠子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代中晚期，这与当时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之间商路的畅通息息相关。在当时，从波斯湾经由印度洋到达印度河流域沿岸地区的海上贸易十分兴盛。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沿岸的阿拉伯半岛东北部地区，同样发现了这类珠子。这一发现进一步验证了海路贸

易在珠饰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这一时期印度河流域的胡达罗（Chanhu Daro）等地，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制造这类珠子的工坊。即便如此，我们尚不能确认这类珠子是否产自印度河流域。因为如同青金石一样，印度河流域可能只是红石髓原料的产地，而非饰品的实际制造地。即便阿拜多斯出土的蚀花珠饰的石料原料来自于印度河流域，但珠饰本身有可能是由两河流域本土的工匠利用进口材料，模仿印度河流域的蚀刻技术加工制造的。

埃及和两河流域之间在公元前4000年代晚期就开始有频繁的物质文化交流往来。从埃及古王国时期开始，埃及与西亚地区的贸易交往通过海路和陆路两种方式进行，前者的航线将比布鲁斯（Byblos）、推罗（Tyre）等地中海西部的港口城市与尼罗河三角洲地区联系起来，后者则沿着亚非大陆连接处的平原地带通行。夏鼐所关注的这颗出土于埃及中王国墓葬中的珠子，应当就是通过二种方式之一从两河流域流传至埃及的。相似的珠子，在埃及与两河流域之间的地区也有发现，例如在现叙利亚地区的马里（Mari）。夏鼐在博士论文的第一章中引用了皮特里的话：“珠子和陶器是考古学研究的字母

《埃及古珠考》
夏鼐著
顾海英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两河流域南部乌尔王陵出土的
蚀花肉红石髓珠（约公元前
2600—2500年）

表。”如今看来，珠子除了在埃及考古学的断代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之外，还是一条能够串通上古亚非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线索。近年来在新疆发现的同类、时期相近的蚀花红石髓珠，进一步将这条长路延伸到了中国的土地上。

诚如前文所言，虽然现在我们对于这颗蚀花肉红石髓珠的来龙去脉有了更透彻的了解，但这还是在夏鼐《埃及古珠考》所奠定的牢固基础之上才能实现的。夏鼐的埃及古珠研究不仅对埃及考古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亦是他在考古学领域数十年开拓、耕耘的理论与方法渊源。近年来，古代研究领域内“回归语文学”“回归考古学”等呼声不绝于耳，而不论取何种门径、治何种学问，我们都不妨首先回归到

夏鼐先生的延长线上。近20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再次有机会走出国门。由中国考古机构和学者主导和参与的考古发掘项目遍及世界，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而这其中大多数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联合考古工作。随着国际考察机会的与日俱增和外国考古人才培养的开花结果，中国的考古学将真正做到“上穷碧落下黄泉”，并且能够将考古学的中国经验介绍给世界。从事了中国考古学近50年的夏鼐先生，在他的研究始终保持着科学态度和世界眼光，而这与他所接受的外国古文献学与考古学训练是离不开的，这便是我们如今重新捧起《埃及古珠考》的意义。

（作者系比利时鲁汶大学古代西亚历史与考古学在读博士）